

解放前房山境内几股反动武装的历史演变及其活动

史长义

国民党联合地主豪绅组织联庄自卫

民国十七年后，国民党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，依靠当地的反动势力，组织“农民协会”，实行所谓的联庄自卫。

当时西北区(原属房山四、五区，良乡县成立后归良乡三、五区)的重要人物是殷耀东。殷耀东系东庄子村人，祖父是满清时代的大臣；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又成了国民党的红人。家族中有两人在国民党中任要职：一个是殷子固，解放前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秘书；一个是殷祖豪(殷耀东的亲哥哥)，系国民党中央委员。由于殷家在政治上极有势力，在经济上也就成了西北矿区的统治者。吃干股(势力股：不拿本，赔了不管赚了使)、开公司(矿产物归公司统收统卖)是他们统治西北矿区的重要手段。

而东北区(原属房山三区，良乡县成立后归良乡一区)的统治者，是晓幼营的王凤来。王凤来家是几辈的大地主，有花果树园二千余亩。他奴役东北区百姓的手段是包干枝(先拿出很少的钱，五年或十年后，树上结的果实均归钱主所有)和指树借钱。

除了殷王两家外，西南周口店的常家也因作过满清的功臣，在国民党中有势力而统治了周口店地区，垄断了周口店地区的商业。

像这样一些地主豪绅，为了保护剥削来的利益，就要相互勾结、相互利用，国民党正是利用地方势力的这种心态，组织所谓的“农民协会”，在各村抓派青年壮丁，强迫买枪进行武装；并且经常集中几百人的队伍到各村游行或训练，实行所谓的联庄自卫。这便构成了房山反动武装的雏形。

生活窘迫 土匪四起

由于有了国民党这个政治上的靠山，王凤来就加紧了对东北区人民的压榨统治，他强迫本主把所有指树借钱和典当手续都给他写成死契，使本主很难摆脱他的剥削。于是当地的人民生活无着，只能出卖劳力，走窑修堤，聊以度日。在冬天，不能出卖劳力时，就背些砂锅到外乡去卖。长期下去，这个地区的百姓就具有了很强的流动性，也练就了小商人般的世故和圆滑。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：“白土面子，沙锅片子，荒河沿子。”民谣的意思是讲东北区的百姓不好惹，其实也正说明了东北区人民颠沛流离的生活情形。于是，一部分青年为生活所迫，铤而走险，便形成各地土匪四起的局面。当时东北区有刘老虎集中 100 多人在戒台寺、金蝉洞一带盘踞，经常到平郊和东北区一带绑票和抢劫(这支土匪后来被王凤来找来廿九军剿除，刘老虎被捕)。西南则有娄子水的胡振海集中一部分人到处挖蘑菇(盗坟)、劫道和绑票，造成社会的极端动乱。

抗日初期各统治代表的动态及矛盾

抗日开始时，殷耀东以东庄子村大商会为基地，王凤来以常乐寺、王佐为基地，仍以自卫的名义继续强迫各村买枪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。西南地区土匪头子胡振海、周文龙、张胡子等抓紧这个机会，把中央军扔下的武器和一部溃散成匪的中央军，连同投奔的土匪纠合在一起，组成一支几千人的匪帮。羊耳峪村苏志超(大恶霸地主)也组织起一支联庄自卫的武装。当时这几支武装的矛盾和活动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：东北区因靠近平郊，王凤来又是死心塌地的汉奸，最招日本人喜欢，当时日本派宣抚班四人经常驻在王凤来家中，给他撑腰。他一面驻在坨里封锁西北，一面与西南的红箍对立。殷耀东比王凤来顾虑多，为了保存并扩大他的势力，一方面联合西南的红箍，一方面和驻长操村的抗日民主专员公署合作，借抗日的名义继续收集枪支，扩大势力。但西北区粮食困难，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，经常要到东北区抢粮。殷耀东部一到东北区就乱抢乱闹，带不走的粮油就扬撒在道边或街道，造成西北区与东北区的对立。西南胡振海的土匪，先叫复仇军，后叫人民抗日军；胳膊裹红箍，专干抢劫绑票的勾当，老百姓都叫他们红眼军。

为了便于在平原上绑票和抢劫。他们联合西北的殷耀东，到东北地区活动。

日寇的进攻与各部的分化

日寇为了在良乡境内伸张势力，首先给王凤来戴上剿匪司令的头衔，同时派大批日军到西南地区，一面扫荡，一面秘密拉拢殷耀东。殷耀东发生了动摇，怕我们改编他的队伍。便经常把队伍拉到山头上表示和我们对抗，准备投降日本。我方识破了他的阴谋，一面号召爱国人士团结起来，真心抗日，一面在河南村把殷耀东控制起来，收缴了他的枪支。对殷耀东的部下，我方指出，愿意抗日的继续抗日，不愿抗日的听其自便。当时檀木港郝绍尧、李各庄赵然等爱国人士跟着共产党起来抗日，殷耀东、殷宗虞等国民党分子，跑到房山城投降了日本。同时，西南红箍在日军军事威胁下，大部投降日军，小部分被我方缴械。周文龙等投降到涿县，孔宪江、张德祥、陈亚林投降到房山。

组成房山伪警备团

日寇进驻房山县城时，王凤来任警察大队长，掌握整个房山境内的军事大权。孔宪江、殷耀东投降后，殷耀东等国民党分子利用党团活动，首先掌握了红箍，并且一方面把殷宗虞打入王凤来的亲信尤茂芝部下，拉拢尤茂芝；一方面把王凤来扣押起来，由孔宪江、张德祥、陈亚林等掌握起军事大权，把苏志超、王凤来全部收编到孔宪江部下，组成一千多人的房山县伪警备团，孔宪江任团长。

自卫团的再次成立

王凤来被推下台后，为了保护他的财产和在东北区的统治，他的儿子王景安投靠日本人，又在坨里成立武装特务队，王景安任特务主任。武装特务专门在东北和西北两个地区破坏抗日工作，阻碍我们的抗日活动：和抗日干部接近的就活埋，有嫌疑的灌辣椒水等。日本进到西北区建点时，殷耀东马上带着段治安、田耀东等回到河套沟。殷耀东当后台老板，段治安联合李各庄段福森等组织自卫团；田耀东联合河南村恶霸地主张宝宇等组织维持会，配合日本统治了西北地区。

日本投降后各部武装的活动

日本投降后，国民党分子、大汉奸李仲三担任六县联防司令兼房山县县长。各地的伪军、警察、武装特务、自卫团等都集中到房山城内，归李仲三指挥。孔宪江被打死后，张德祥任团长。他们依据房山县城向外活动。在军事上除包围捕捉我工作干部，以屠杀手段镇压人民复仇运动以外，还配合政治宣传；到处宣传“我们跟真八路合作，真八路军在延安，我们打的都是土匪”，借以离间抗日民主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。

复仇运动与还乡团的成立

日本投降后，西北区全部和东北区北车营一带十几个村庄，都搞起了复仇运动。王景安、殷耀东、郑师桥(坨里大地主，日伪时的坨里乡长)、杨洪志(北车营村地主，日本的大灰厂警察所巡官)等到长辛店一带收拢被人民清算的一部分汉奸、恶霸、恐慌逃跑的敌伪人员、流氓分子、地主和流亡大乡队成员组织还乡团。他们当时的生活费和枪支费，完全依靠在芦沟桥、长辛店的交通要道上勒索东北区和西北区到北平、丰台卖山货的百姓。他们经常在夜间突然到东北活动，专门屠杀我村干部，制造了很多惨案；并利用特务活动威胁群众，威胁我村干部，诱我干部群众投降。当时有一部分认识模糊的村干部跑去参加了还乡团，给我们的革命工作造成了损失。

还乡团的继续发展及活动

全面内战爆发后，各地还乡团跟随在蒋军的后面，到坨里、焦各庄等地安下据点，胁迫我各村干部一部分一部分地参加了还乡团。当时他们的活动，除抓紧据点附近各村征粮抓兵外，为破坏解放区工作，经常到我边沿区扰乱，特别是在每次群众运动时更厉害。1947年5月复查时，他们计划了一次大的进攻，刚走到河北村，就踏响三十多个地雷；接着又奔袭包围檀木港、北窖，突击河北，抢去北窖、檀木港、李各庄等村很多牛羊等胜利果实，并拉走一部分地主、富农和群众。后来我们逼近据点，他们又实行了一种军政结合活动的办法，把磁家务、北车营等边沿村庄群众全部赶走，制造无人区。以后每次出来活动都把赶走的群众组织起来，胁迫他们到边沿地区抢粮，并胁迫一部分青壮年带枪保护抢粮，以此逐渐拉他们加入还乡团。此外，还乡团利用跑出去的一部分地主，做造谣宣传，制造蒋统区人民对解放区的恐惧。在他们这种活动下，又有一部分地主富农的青壮年和被蒙蔽的农民参加了还乡团。

3760 部队的编成与士兵成份的改变

在我军胜利进击的震慑下，张德祥把所有的伪军和十三个大乡的还是团共三千人合编成三个团，沿用河北省保安旅的编制，组成番号为 3760 的部队。张德祥任部队长。这个部队在开始时，伪军还乡团合计有一千多人左右。这一千多人内，敌伪人员、地主、流氓占绝大多数。这些人由于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，认为我军俘虏中央军放，俘虏伪军还乡团杀，所以战斗坚决，不开小差。在西南几次伏击和坨里的歼灭战以及我们对伪军和还乡团的宽大，使还乡团和伪军开小差的增多。迫使其抓新兵充数。抓到的新兵，农民成份居多，由于被严格监视，不敢逃跑；这样，老兵逐渐减少，新兵的比例逐渐增多。1948年解放前夕，3760 部队的三千人中，农民成份的新兵就占了二千至二千五百多人，大大地改变了他的成份。

（《房山文史资料》第 2 辑）

作者系区文联主席